

# 目 录

一、宣德帝与“促织之戏” .....	1
二、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.....	3
三、文献中的宣德官窑蟋蟀罐 .....	7
四、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.....	11
五、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瓷器和蟋蟀罐的分期 .....	21
六、宣德官窑蟋蟀罐的造型与年款 .....	28
七、宣德官窑蟋蟀罐上的青花纹饰 .....	37
八、宣德官窑蟋蟀罐“斗盆”“养盆”之辨 .....	55
九、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.....	62
十、小结 .....	69
十一、宣德官窑蟋蟀罐图例 .....	71





## 一 宣德帝与“促织之戏”

明宣德帝——朱瞻基，从洪熙元年（1426年）六月即皇帝位，至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元月病逝，年仅36岁。明王朝有国277年，宣德一代仅仅只有九年零七个月，就整个明王朝来说，它有如短暂的一瞬，然而这却是明代最辉煌的一瞬。明史学家把这一瞬，比作西汉时代的所谓“文景之治”<sup>①</sup>，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，清初以谨严称著的学者，也给这一瞬以“纪纲修明，仓庾充羨，闾阎乐业，岁不能灾”的评价<sup>②</sup>。
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干，而且还有许多雅好，比如“留神词翰”、“尤工绘事”<sup>③</sup>、“好促织之戏”<sup>④</sup>等等。对宣德帝的前两种爱好，人们深信不疑，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墨迹流传至今。而对后一种嗜好，则有不同看法，因为宣宗好蟋蟀的记载，大都出自晚明时代的野史笔记，且无实物证据。所以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在阅读文学名著——《聊斋志异》中“促织”（一篇描写因宣德宫中尚蟋蟀，官府逼一平

民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)一文后,便很有感慨地说:

宣德治世,宣宗令主,其台阁大臣,又有三杨(荣、溥、士奇)、蹇(义)、夏(元吉)诸老先生也,顾以草虫纤物,殃民至此耶?惜哉!抑传闻异词耶?<sup>⑤</sup>

王氏在这里除对宣德间岁贡蟋蟀的史实表示怀疑外,他的宣宗令主、台阁贤良之类的议论,似乎还意味着:宣德帝不会或者说没有可能对微不足道的小虫——蟋蟀产生兴趣。

至于宣德朝是否有“岁贡蟋蟀”的命令,本文可以暂不讨论;而对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,则应给予注意。因为历史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,假如皇帝真有此好,必然会在遗物方面留下蛛丝马迹。

注释:

- ① 清·谈迁撰《国榷》“宣宗·宣德十年”引明人何乔远的评论,中华书局排印本,1483页。
- ② 清·张廷玉等撰《明史》卷九《宣宗本纪》,中华书局排印本,125页。
- ③ 清·徐沁《明画录》卷一,见于安澜《画史丛刊》第三册1页,上海美术出版社。
- ④ 清·蒲松龄《聊斋志异会校、会注、会评本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489页。
- ⑤ 同注④。

## 二 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



蟋蟀，属昆虫纲、直翅目、蟋蟀科，本文所叙述的蟋蟀，属“斗蟋”（学名 *Gryllus chinensis*, 图1）<sup>①</sup>。该虫在西汉时别称“登”，晋人以其鸣声如织，又称“促织”，明清时叫“蚰蚣”，据说是蟋蟀鸣叫的声音相转而成<sup>②</sup>。

中国最早的文献——《诗经》一书中，就有蟋蟀的习性与季候冷暖相关的描述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宋画，就以《诗经·七月》为根据<sup>③</sup>，把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的事物，并列地摆在一个狭长的手卷上（图2），让人们在同一时空看到该虫“七月在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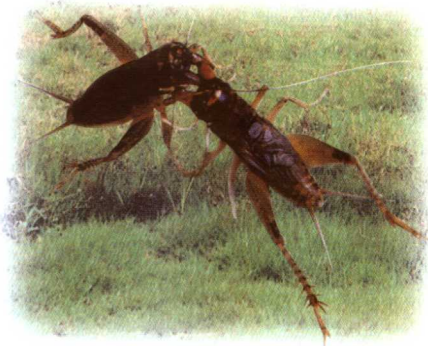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. 斗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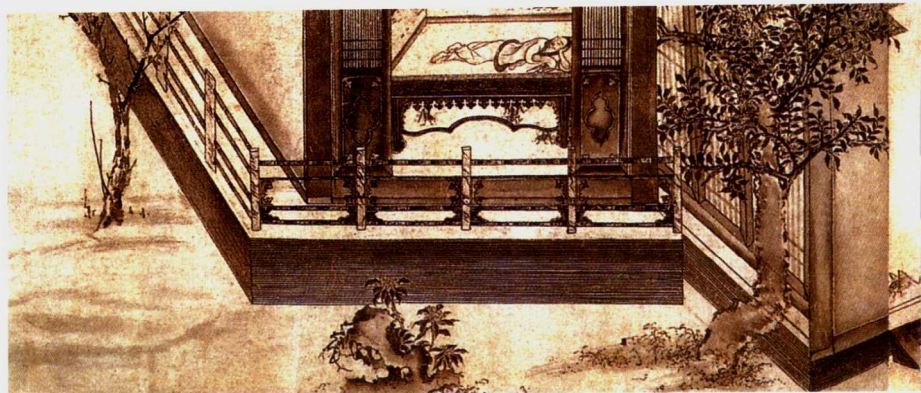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. 宋人绘《诗经·七月》诗意图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

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入我床下”的情景<sup>④</sup>。蟋蟀（我国习惯称雄虫为蟋蟀，雌虫为三尾）在求爱时发出的鸣叫，婉转而又深情。公元6世纪齐梁时代的高僧——道贲，就把它比做大自然的箫管<sup>⑤</sup>；唐代天宝年间的宫女，还把它装进金丝笼放在枕头边，于夜深人静时尽情地欣赏它那如泣如诉的鸣奏<sup>⑥</sup>。它好斗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发现。从此，其音乐家的命运便宣告结束，而它只能以“职业斗士”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了。当时的蟋蟀饲养者就像斗鸡、斗狗，或者赛马者一样，他们利用两只可怜的小虫在相聚时一决生死的撕咬，来取乐、营利并进而设赌。南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临安之蟋蟀市场时谓：

（蟋蟀盛出时）乡民争捉入城货买，斗赢三、两个，便望卖一两贯钱。茗（若）生得大，更会斗，便有一两银卖。每日如此。九月尽，天寒方休<sup>⑦</sup>。

养虫、斗虫不仅在宋代市井流行，而且还影响到当时的官僚贵族，如《宋史》就记载着：当蒙古重兵围困襄阳，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，醉生梦死的丞相贾似道还在“与群妾踞地



斗蟋蟀”<sup>⑧</sup>。宋以后也和宋代情况约略相似，如明人陆灿在《庚巳篇》中，记载着一虫迷在他的“英勇善战”的蟋蟀死掉之后，竟然会像虔诚的佛教徒对待释迦舍利那样，“以银作棺葬之”<sup>⑨</sup>。清·光绪间拙园老人《虫鱼雅集》中还说到北京的某玩家，为了纪念“打遍京师无敌手”的蟋蟀——“蜈蚣紫”，在自家的花园中建立了“虫王庙”，像祭奠祖先那样地祭奠蟋蟀<sup>⑩</sup>。

从有关文献来看，中国约在3000年前就有关于蟋蟀生态方面的描写，8世纪为了欣赏其悦耳的鸣叫而开始饲养，12~13世纪出现斗虫之风。明宣德年间离宋代已有两个多世纪了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当然不足为怪；但问题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爱好，如果有，这位帝王必然会留下相当精美的虫罐(蟋蟀罐)。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，斗虫家十分讲究养虫的盆罐，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南宋临安的斗虫者就拥有所谓：“银丝为笼……黑退光(漆)笼……”之类，明人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当时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称作“将军府”<sup>⑪</sup>。笔者认为，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，也不例外。

注释:

- ① 关良等《蟋蟀新谱》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5页。
- ② 清·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“下三·释虫”，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木刻本，9页。
- ③ 清·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卷十《唐·蟋蟀》上册，10页，同书卷十五《七月》上册，76页，商务印书馆1934年排印本。
- ④（美）方闻《超越的描绘》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992年英文版，222~223页。
- ⑤ 唐·释道演《续高僧传》第六“释道超”条，日本大正新修《大藏经》五十册，472页。
- ⑥ 唐·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见《说郭三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382页。
- ⑦ 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，见《东京梦华录五种》，中华书局，120页。
- ⑧ 元·脱脱等撰《宋史》卷四百七十四《贾似道》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三十九册，13784页。
- ⑨ 明·陆灿《庚巳篇》《说郭续》卷四十六，见《说郭三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688页。
- ⑩ 清·拙园老人《虫鱼雅集》卷一，光绪甲辰（1904年）排印本，3页。
- ⑪ 明·刘侗等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六“胡家村”录歙县闵景《观斗蟋蟀歌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25页。

### 三 文献中的宣德官窑 蟋蟀罐



关于宣德官窑以及宣德间其他地点烧造的蟋蟀罐，明、清笔记有下列记载：

1. 明·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说：

今宣窑蟋蟀罐甚珍重。其价不减宣和盆也<sup>①</sup>。

2. 明·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“陆墓促织盆”条谓：

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，出陆墓、邹莫二家。曾见雕镂人物，妆采极工巧<sup>②</sup>。

3. 近人徐珂辑《清稗类抄·著述鉴赏》王丹思条说：

（宣德）宫中贮养蟋蟀之具，精细绝伦，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，视若奇珍。



又说，王丹思购得的宣德餞金蟋蟀罐，为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旧藏，王曾作长歌纪事谓：

星移物换秋复秋，长闻唧唧虫吟愁。  
金花暗淡盆流落，流落人间同瓦瓿<sup>③</sup>。

上列文献1~3所述，为景德镇官窑瓷盆，所谓“金花暗淡”、“同瓦瓿”者，当指宣德官窑的“贴金”或者“描金瓷器”，而不是其他材质的器皿，否则诗人就不会以瓦瓿相比了。文献2为苏州所烧的陶盆，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。遗憾的是吴伟业与王丹思的旧藏未能流传下来，使我们无缘一见庐山真面目。关于宣德官窑虫罐，除前述史料之外，近人还有以下记录：

1. 1931年李石孙《蟋蟀谱》卷一“盆考”条，绘有“大明



图3. 李石孙《蟋蟀谱》刊出“大明宣德制”虫罐



图4A. 青花牡丹纹虫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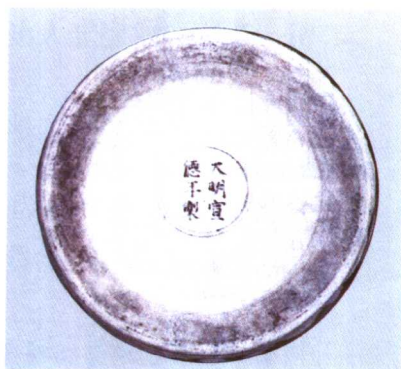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B. 青花牡丹纹虫罐底款



图5. 索斯比公司1989年11月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刊出的黄地青花瓜叶纹虫罐



图6. 青花怪兽纹虫罐  
日本户栗美术馆藏

宣德罐”线图一帧（图3），罐作筒形，盖面与罐身绘有四爪龙纹<sup>④</sup>。

2. 耿宝昌《明清瓷器鉴定》第三章，刊出一青花罐，缺盖，外壁绘牡丹，罐底有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六字楷书双圈圆款（图4A、图4B）<sup>⑤</sup>。

3. 索斯比拍卖行1989年11月，在香港出版的一本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，45页刊出一黄地青花瓜叶纹虫罐（图5），罐盖正中有金属小纽，纹饰与常见宣德器一致，但无款<sup>⑥</sup>。

4. 日本户栗美术馆藏有一虫罐，底盖均有六字楷书双圈款，罐身绘青花怪兽纹（图6），其造型与耿书中一致<sup>⑦</sup>。

细察以上图照，笔者以为：资料1线图盖罐上所绘龙纹，形象臃肿，毛发平披，为清代龙形，而不作竖发式，没有明代龙纹的特征，很可能是晚清时代的一件冒名伪器。资料2~4所述的花纹与景德镇近年来出土的永乐、宣德青花瓷器上的同类花纹相似，青料的色泽深沉、凝重，也与永宣时代所用“进口青料”相同，因而笔者以为年代可靠。

综观以上史料，宣德官窑虫罐曾以其精美著称，在晚明时代就已和宋代宣和窑遗物的价格相当了。然而传世品异常稀少，如果加上李石孙刊出的一张线图，现存虫罐不过四件而已。但这四件虫罐上的花纹，都不是皇帝的专用纹饰，充其量只能说明宣德宫中曾养过蟋蟀，宣德帝是否真有蟋蟀之好，却还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。

注释：

- ① 明·沈德符撰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四“技艺·斗物”条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625页。
- ② 明·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9页。
- ③ 徐珂《清稗类抄》“著述·鉴赏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366页。
- ④ 李石孙辑《蟋蟀谱》卷一“盆考”插图七，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石印本，9页。
- ⑤ 耿宝昌《明清瓷器鉴定》，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，50页，附图87。
- ⑥ 索斯比公司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1989年版，45页。
- ⑦（日）户栗美术馆《中国陶瓷名品图录》，东京绿箱社1988年日文版，87页。



## 四 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 宣德蟋蟀罐

1982年11月，景德镇有关单位在珠山路铺设地下管道时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厂故址南院的东墙边，发现了大量的宣德官窑残片。计有青花、祭红、蓝釉等，绝大多数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。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时，曾拼合出一鼓形盖罐。该罐直径13.2厘米，高9厘米，通体挂淡青釉，并有细小纹片，口沿露胎处呈淡红色，近似宋龙泉青瓷上的所谓朱砂底。有盖，盖的直径与口径一致（图7）。盖底与圈足正中有“大明宣德年制”青花双圈六字款<sup>①</sup>。经



图7. 1982年在景德镇珠山路发现的平盖式青釉蟋蟀罐



与晚清著名画家任伯年的《村童斗蟋蟀》图(图8)<sup>②</sup>相比较,二者造型一致,因而可以确认,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盖罐为蟋蟀罐。

1993年春,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,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厂东门故址附近开探沟一条,于沟的北端距地表深约1.5米的宣德窑渣中发现一呈窝状堆积的青花残片,经复原全为蟋蟀罐(图9)。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有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单行青花楷书款。罐底款竖排,盖内底款横排。紧接着又在下层褐黄色的沙渣与祭红、白釉、紫金釉刻款碗盘废品堆积中,发现了另一窝青花瓷片,经复原,亦为蟋蟀罐<sup>③</sup>,随即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置于蟋蟀罐(养盆)中的“过笼”。过笼,扇形两面绘青花折枝花,但无款,缺盖,和江苏镇江宋墓出土物一致,但比晚清时代苏州陆墓所产过笼稍大。这件遗物即文献中所说的大名鼎鼎的“宣德串”(图10)<sup>④</sup>。

以拼合复原出来的成品计,上下两层共出土虫罐21件,其造型虽与1982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,但器盖大异。青釉罐的口径与盖的直径一致,青花罐盖的直径略小于罐口,盖正中心作一小孔,盖罐合拢时,盖陷于罐壁之中(图11A、图11B)。对照前述李石孙的《蟋蟀谱》,青釉罐为“平盖式”,青花罐则是所谓“坐盖式”虫罐。



图8. 晚清画家任伯年所作《村童斗蟋蟀图》





图9. 景德镇中华路上层出土的青花虫罐



图10. 景德镇中华路出土的青花过笼(缺盖)与苏州陆墓晚清陶质过笼比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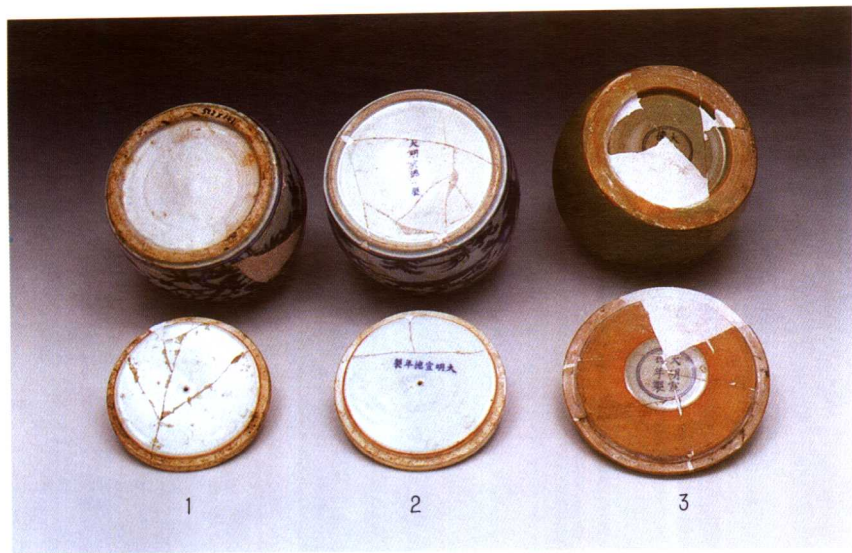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1A. 景德镇珠山路与中华路出土的虫罐比较：1. 中华路下层出土的无款罐 2. 中华路上层出土的单行款罐 3. 珠山路出土的圆款罐



图 11B. 景德镇珠山路与中华路出土的虫罐

就所谓坐盖式青花虫罐来看，因地层不同而有下列差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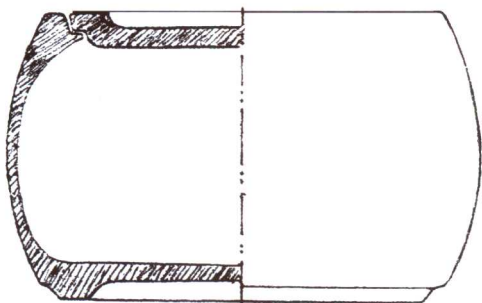
1. 上层出土的虫罐器壁较薄，下层出土的虫罐器壁则较厚。

2. 上层出土的虫罐内壁底部刷有一层极薄的釉层，并有意刷得凹凸不平，时见淡红色的瓷胎（即所谓窑火红）；下层虫罐之底因无釉而露出粗涩的瓷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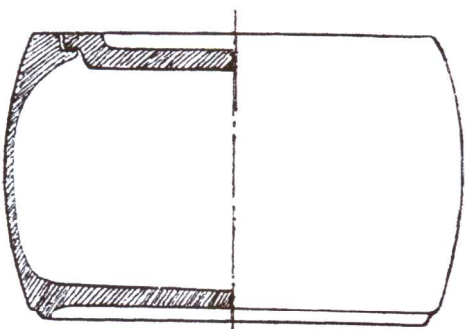
3. 上层出土的虫罐盖与底都有单行六字年款，下层出土物全无年款。

4. 上层出土的虫罐纹饰有龙凤、海兽、珍禽异兽、松竹梅、瓜果、牡丹、樱桃及小鸟等，下层出土的虫罐仅有后四种纹样，而无龙凤、海兽之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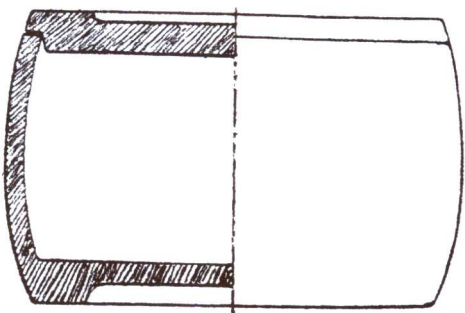
5. 上层出土的虫罐上纹饰用笔清雅潇洒，下层出土的虫罐纹饰则



1. 景德镇中华路下层出土的宣德无款罐



2. 景德镇中华路上层出土的宣德横竖款罐



3. 景德镇珠山路出土的宣德圆款罐

图 11 虫罐的实测图



画得较为粗重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：上层出土的绘有龙纹的虫罐（图12），其龙纹无论是云龙（图13）、行龙均作双角五爪，即使是无角无鳞的螭龙纹（图14），也画成五爪，以往的发现均作四爪。按元、明两朝的制度规定：凡饰有该类纹饰的器物，除帝王之外，其臣庶均不得使用<sup>⑤</sup>。故可以肯定：上述龙纹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。至于出土于同一地层的、饰有其他纹饰的盖罐，则由于封建时代有“上得兼下，下不得似上”的规定<sup>⑥</sup>，它们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，也有可能为宫中其他人员使用的虫罐。众所周知，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，系官窑烧造的贡



图12. 景德镇中华路上层出土的行龙纹罐



图13. 云龙纹罐

图14. 五爪螭龙纹罐

